

文汇讲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3年8月25日 总第64期

文汇网:www.whb.cn 邮箱:whjt@wxjt.com.cn

公告栏

扫描二维码，关注文汇讲堂微信公众账号、加入文汇讲堂读者俱乐部。不仅将获得每期讲座信息，更有主题摄影、参观访问、新媒体训练营等活动邀您参与。



文汇讲堂
微信公众账号



文汇讲堂
读者俱乐部

国力上升期的精神成熟



邱震海
主讲嘉宾

1962年生。著名时政评论员、学者，中国转型和战略问题专家，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成员，凤凰卫视评论员、《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同时兼任东南亚和欧洲部分报刊专栏作家，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等职。

过去二十多年里，先后在中国大陆、欧洲和香港三地的大学、媒体与商界工作，以多元视角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近年将触角延伸至中国经济转型方向、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及其风险掌控、中国国营和民营经济发展前景、中国经济走向背后的政治因素、中国对外战略整合、国民集体精神世界成熟和民族思想史等领域。



萧功秦
对话嘉宾

1946年生。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1999年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2001年至2002年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范围：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当代政治发展。

民族性与强国梦

编者按：

邱震海先生提出了国力上升期的国民精神成熟问题，他认为，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倍受挫折，而现在正是国力上升期，如果要避免种种弯路，当务之急是要经历一个思想启蒙阶段，通过公共讨论等有效方式，让国民精神迈向集体成熟。此文梳理本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上哲人、学者对国民性和民族强大的诸多言论，供各位共同探讨。

国人百年来的迷茫

“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沉沦》的主人公跳海前留下的话，虽然是郁达夫在1921年前写下的，却仍然是众多国人的心声。在9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是富起来了，但我们却很少感觉到我们的民族是真正地崛起了。无论是面对国内事务，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还是面对国际环境，与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我们或无所适从，或群情激奋，似乎总是难以找到能够理性沉稳地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的迷茫或许始于鸦片战争，近代史是写满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血泪史……面对西方的强大，读书人开始思索强国之路。政治上需要改革，但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结果总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思考更本源性的问题，造成我们落后的究竟为何？是制度落后于人，还是民族性本身尚未启蒙？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19世纪末，文化大师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

人缺乏抽象和理性思维的传统。而后，五四运动对于现代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郁达夫对于苦闷知识分子的描绘……莫不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最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内心的迷茫与虚无却与日俱增。眼下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仍然接续了一个世纪前的讨论：究竟是应该先进行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还是应当进行国民思想的启蒙，培养起成熟、理性的国民性？

知识分子对民族性改造的探索

国民性问题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也正是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提到的希望有人翻译出来的“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史密斯在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

西方人对国人的观察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民族性做一番考察。严复对于国民，显然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对于变革而言，应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与严复类似，梁启超也将国家的衰弱归咎于人民，认为国民民德缺乏，因此首先应当“维新我民”。

而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则并不认为

中国人是真正地落后于人，甚至认为中国人应该更有优越感。在他看来，尽管中国人相对于西方人来说缺乏信仰和理性，却比西方人更“明心见性”，不像西方人那样专务外表。

国民性的缺陷，孙中山也看得很清楚，他不否认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否认中国人缺乏自修的工夫，甚至基本的社交礼仪。但是他始终坚持将国民性缺陷归结为民权缺乏。中国人政治思想的薄弱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天性愚笨，而在于统治阶级“堵塞人民的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因此，与严、梁不同，他并不认为应当先进行启蒙，再施行改革，而是将政治参与本身作为一种教育。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鲁迅显然是批判国民性最激烈的人。他所描绘的阿Q、孔乙己、闰土等角色，莫不以愚昧无知的形象深入人心，使得“国民性”作为一个贬义词进入人们的脑海中。然而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作为次要角色老爷们，又何尝不是逼迫阿Q们变得愚昧的诱导因素呢？

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思考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制度还是国民性的争论，也让人想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论述：我坚信，政治社会并非它们的法律的产品，而是从一开始就是由其成员的情感、信仰、观点和心灵习惯所决定的，而这些又是由自然和教育形成的。

他认为，美国的民主之所以能够克服“多数人的暴政”，相对于欧洲国家优越，不仅仅因为其良好的地理位置，以及从英国带来的先进法律制度，

真正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美国的民情。他所说的民情，法文为 *moeurs*，来源于拉丁文的 *mores*，“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简而言之，托克维尔的民情指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知识因素的总和。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民情使美国人能够脱离开旧大陆上日薄西山的贵族制的拖累，造就一片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新大陆。

而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良好的民风对于维护民主原则至关重要。导致罗马衰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共和制的消亡、法律制度的破坏，根本原因也在于民风的败坏。但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民风是确立完善法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后者毋宁说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就的。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更是将资本主义的经济高度发达与新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加尔文教派清教徒的虔诚、俭朴、勤劳、精于职业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终极价值，促成了制度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新教信仰本身，是否也是在信仰自由的制度性框架下确立的？

理性的民情、良善的民风、虔敬的信仰……这些精神领域的因素，恰恰是我们近代中国人所缺乏的。而这些品质究竟是制度的后果还是原因？中国人要真正实现强国梦，需要探讨和实践的显然还有很多。

(撰文 文汇网实习生、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谢怡华)

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法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更有希望的。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中国人三十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什么一些民间的激进民族主义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对待国际问题？激进的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支配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事实上，极左政治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虚骄与高调，与历史上近代清流民族主义有着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

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是一种以某种“主义”来推演和涵盖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

——《近代思想史上的主义崇拜：严复与胡适的思考及其启示》

由于这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行体制是在中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原来的列宁主义的全能主义体制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后全能主义”来概括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确实能表达这一新的政治结构模式与传统全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然而，后全能主义只是一种历史时段的描述，没有能揭示结构特点。因此，我进而综合以上两方面特点，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即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

——《中国的大转型》导言

好的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按某种方向尝试，逐渐找到适应的办法，渐进地接近目标；好的秩序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果，生长的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本文整理 谢怡华)

萧功秦主要观点